

序 一



李伯重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清代关税：1644—1911年》认为，如果一位学者对历史缺乏了解，那么他将不可能对清朝的关税及清代中国政治经济的一般性在实质上有透彻的认识。

无须为财政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正名。现代财政孕育了现代经济史及现代国家，同时还能使我们从现代社会中追溯那些传统社会财政革命中的伟大进步。

这项研究描述并分析了清代财政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公共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关税。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税和人头税占据财政收入的大宗，而关税只占据很小的比例。在西欧早期近代化时期，关税增长非常迅速，最终取代了土地税和人头税，成为财政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类似的变化同样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发生，这一变化也是自19世纪中叶开启的中国近代化变迁的一部分。

在清朝，关税涵盖了国内贸易及国际贸易的所有商品，并由两个机构分别征收。这两个机构分别为：常关，即针对国内贸易商品征税的一般性关口；洋关，即针对国际贸易征税的关口。在该书中，由这两个机构征收的税都被称作“关税”。尽管在这里我们对常关和洋关的职能做了清晰的界定，但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的职能是相重叠的。此外，在19世纪晚期，国内关税主要由厘金（likin）构成，很多情况下厘金由地方政府征收，尽管此时

掌管进出口税务的现代海关服务已经从西方引进。为避免读者对清代中国税收的不同含义而引起的误解，在此我们采用它们原始的名字——关税（guanshui），而非英文翻译过来的关税（custom duties）。

关税问题在清朝国家财政中占据特殊的地位。19 世纪中叶以前，关税已经在清朝财政收入中占据了相当可观的份额^①，尽管土地税占据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是财政收入的基石。然而，19 世纪下半叶关税陡然上升，在清朝的最后十年一跃成为第一大财政收入来源。^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关税，那么清朝将无法管理国家，甚至无法生存下去。因此，关税对理解清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清朝见证了关税重要性的变迁。在清朝统治的前两百年中（1644—1850 年），国家遵循了传统财政的基本原则——“量入为出”，并且长期基本没有变动。清代中后期，传统财政体系甚至连同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家财政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关税迅速增长，这一变化导致的结果是关税连同土地税及盐税共同组成了清朝的三大财政支柱。^③

这一变化发生在世界历史的大转折时代，最近被称之为“大分流”。安格斯·麦迪森同样认为，19 世纪中叶是中国经济从长久繁荣走向长期衰落的转折点。^④恰好在此时期，中国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崎岖坎坷之路，财政

① 根据申学锋的研究，18 世纪下半叶和 19 世纪前期清代财政收入中，关税占据 11%—12% 的份额，参见申学锋：《清代财政输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北京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第 84—90 页。

② 申学锋认为，1911 年关税和厘金共占据财政收入的 47%。这一比例远远大于其他主要收入来源土地税（27%）和盐税（26%），《清代财政输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北京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王国斌（R. Bin Wong）认为，1849 年财政收入为 4250 万两白银，77% 来自农业，其他来自商业。1885 年，财政收入大约增加至 7700 万两白银，主要来自商业税的增长。在这一时期，商业税增加了 3 倍。1911 年，清朝最后一个财政年份，收入达到 3.01 亿两白银，农业税从 1885 年的 3000 万两增加至 1911 年的 5000 万两，而杂税有 4500 万两，商业税则占 2.07 亿两以上，参见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ter 1.（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8 年。）

③ 其中，鸦片税占据全部财政收入的 10%，参见周育民：《19 世纪 60—90 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第 52—60 页。

④ 安格斯·麦迪森：《*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Second edition）. 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7, Chapter 1.（《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第二版），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心，2007 年。）

改革在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在清代财政中的特殊地位，关税的变迁被认为是清政府挽救政权及实现现代化的标志。

清代关税的现代研究可追溯至一个世纪以前。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前辈学者在研究上已经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特别是最近十年，正在尝试与日益发展的历史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英文缩写GDP）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先行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但不可否认仍存在一些缺陷，数据材料和方法论两个方面也存在一些研究空白。因此，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未对关税及关税在清朝政治、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一个精确、完整的认识。该书主要力图填补这些空缺，特别是旨在为关税研究建立一个可靠实用的数据资料库，并进而解释其背景和意义。

该书作者曾花费了数年时间搜集 19 世纪前半期的关税数据并进行充分分析，其成果《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已经在 2010 年出版。^①这本书是清代关税研究的一项新探索。作者完全依据第一手档案史料，为其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出版之后，作者花费了更多的精力进行数据搜集工作，并进而改善了研究方法。作者研究的新成果——《清代关税：1644—1911 年》的出版证明多年艰辛的劳动是富有成效的。

这本新书有一些关税领域的重要发现，对我们理解清朝的政治、经济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一，该书揭示了关税变迁的趋势。在清初及清中期，常关税（由常关征收的税）保持稳定，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下降幅度达到一半。相反，洋关税（由洋关征收的税）大幅增加。两个税种相加，关税总额由清前期的每年 500 万两白银增加至清末的每年 3500 万两白银，增幅为 6 倍。其间，由长江和大运河征收的常关税仍占据所有常关中的大宗，而港口的洋关税则保持了更迅速的增长。这一趋势反映出中国贸易由内陆到沿海的关键性转变。

^① 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第二，通过人口和物价数据，作者对清关税总量做了重要的修正和增补。政治制度和财政发展之间紧密的联系决定了清代财政史的分期。该书明确将其划分为两个时段：1644—1850 年和 1850—1911 年，1850 年为分界线。作者发现人均关税额在 1850 年之前保持稳定，但在 1850 年之后迅速蹿升，增长 7—8 倍之多。此外，通过物价指数的修正，相比于 18 世纪下半期，19 世纪上半期的人均关税额实际有所下降，由此，所谓“道光萧条论”可能是正确的。1850 年以后，关税额大幅增长，但实际上仅增长 4—5 倍，而不是名义上的 7 倍。

第三，通过利用关税，作者对一些特殊年份，如 1724 年、1766 年、1812 年、1840 年、1850 年、1887 年和 1910 年的商业出口量进行了估算，既包括总额，又包括人均数额，进而得出结论：商业出口在 1766 年达到了峰值，随后在 19 世纪上半期平稳缓慢下滑。此后，它急速增加，并在 1887 年达到新的巅峰。1910 年，有所回落，但仍是 1850 年之前的两倍。这项尝试为研究中国历史时期 GDP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第四，作者认为，关税的发展促使中国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财政向以商业为基础的新型财政变迁，同时也可以看出 17—19 世纪财政制度由传统转向现代转型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并不是通常被认为的“例外”。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轨迹从来没有偏离世界主流道路。

第五，传统观点认为，中国长期与外界“隔绝”，特别是与现代西方“隔绝”，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英国击败中国后，才被迫对外开放。但是，这一长久以来的传统认知近年来受到了强烈挑战，一种新的观点正在形成。这一新观点，史景迁表述得非常清楚：“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已经至少在 17 世纪开始就与稀缺资源的搜集、货物的交换以及知识点扩张密不可分。”^①受全球史启发，作者特别强调了洋关税的变迁及其对清朝政

^①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2012, Preface.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纽约：诺顿，2012 年，前言。)

治、经济的影响。将中国置于全球化语境中审视，是作者在这本书中进行的切实的努力。

总而言之，该书代表了中国财政史领域一项新的成就。清代中国，尤其是晚清，是一个丰富的体系，宛如一项精密复杂的实验，如外债和现代关税，挑战着我们对于典型的前现代财政发展的认识。透过宏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该书揭示了在背后推动和强化中国经济集约化、创新及整顿的模式及相关因素。了解以上这些，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经济的模式及革新；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在长时段中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这是作者的目的。

序 二



Maarten Duijvendak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近现代史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经济史教授）

这本书展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语言对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由于缺乏掌握中英双语的国际学者与广泛研究档案材料的机会，大量有趣的中国历史仍然不为外界所知。其次，该书的研究基于十多年间在不同档案馆中的大量工作，而这正是其所展现的，即第一手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对档案材料中的原始记录进行细致的搜集、整理，将定量的数据与定性的思考相结合，构成了该书的研究——通过财政收入反映 250 多年间中国国内外贸易的概况。倪玉平教授的研究以税收的沿革为线索，贯穿整个清代（有时略做上溯），展示了如下几个方面：关税对于官方是何等重要，如何通过财政制度的整合实现税收的最大化，制度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环境，中国的税务官又是如何汇报工作的。全书呈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的贸易状况。

该书用于讨论关税的一系列资料是从不同的档案馆搜集而来的。国家的边境、长江沿岸各港口、京杭大运河沿线，以及东海岸的港口均征收关税，有关的资料只有极少数能为不懂中文的学者所见。倪玉平教授将这批资料中已出版的部分与原件进行了核对。他结合文件形成的具体背景，对它们进行精细的整理，通过图表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并据此进一步探讨导致关税收入波动的原因，以及时人（如皇帝、税务官）在他们的信件、报

告中对这个现象所做的解释。通过对相关数据、资料的评估，该书的结尾对清代中国贸易的发展历程做了审慎又具有批判性的解析，并对其做了总体性的评价。

该书的研究目标在于加深人们对于“大分流”这一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的认识，亦即如何解释近代早期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出现的分叉。“大分流”如何发生，又缘何发生？当然，现有的研究已经给出了许多答案，但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不同的维度，相关的讨论正在不同的层面、角度上持续进行。除了部分研究将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作为英国崛起、中国衰落的原因，大多数研究都将注意力集中于英国与欧洲大陆自身的转变上。这些研究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工业革命、欧洲城市的持续发展、政府构成的多样化、帝国的建立及其与殖民地的联系都促成了欧洲在文化上的例外主义。而同时期的中国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具有惰性的社会——农耕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在国家内部形成了某种平衡，缺乏发展的动力和诱因。此外，中国政府也被认为是保守的。他们试图维持现状，避免任何形式的改变，并且偏好无为而治，不愿或无法提高税收和资本市场放贷。诚然，该书无法彻底解决税收和政府结构上的争论，但为这个议题注入了全新的要素，将讨论推上了全新的高度。

财政史是倪玉平教授在此议题上取得突破的主要领域。尽管税制并非本书的主要关注点，但他仍然将大量实践性的材料与制度性的材料相结合，更加深入地理解了经济发展、税收与政府结构的关系，以及其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就此议题，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般而言，内部争端——如对大地主的清算和对农村的强制征税——产生了欧洲国家重要的组织特征，如军事力量对文官系统的相对从属关系、对财政进行广泛监督的官僚集团……”^① 他的观察虽是基于欧洲社会，却为

^① 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理解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框架，尤其是对理解中国的军事。在雍正朝，帝国向西推进，而晚清时期，面临太平天国运动和西方列强的侵略，这些都强烈依赖于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战争需要新的税收，这加强了帝国整顿现有税制的愿望，如土地税、盐税和关税。吊诡的是，鸦片战争这一不幸事件反而迫使中国对东海岸各港口的商业和财政机构进行重组。

该书认为，有清一代各关关税的变化反映了财政体系的大致发展过程。税收仿佛一个镜面，能够反映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如通过各行业税收额的差异），但这个镜像十分复杂，有时甚至是模糊而破碎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正是阐明这个镜像是如何被扭曲的。该书通过对赋税收入及相关的文件进行系统、批判性地考察与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批判性的阅读深化了不同来源的数据材料的整合，大量征税环节中的细微调整，以及18世纪中期以降贸易税地位逐步提升的过程都变得清晰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税收管理体系，贸易本身也变得更为重要。在清代前期，帝国内部的商品交换是保障农耕社会的一种附加物。贸易不被视为赚钱的手段或是实现经济转变的工具，也不会超出个体商人经营的范畴。相反地，它被官方视作调和农耕社会缺陷的手段，尤其是当某个区域发生灾害时，能够从有盈余的地区进行资源转输。然而，一种新的形势在晚清时期（约1840—1880年）显现出来。贸易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带来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国家的关税收入来源于贸易的税额翻了三番。这段时期内，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国内贸易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总体仍然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新的太阳自东方冉冉升起。起初，上海地区来自国际贸易的税额要高于其他地区，但这种现象很快便扩散至整个中国社会。普遍的税制改革随之而来。在西方国家的压力和援助下，清朝完成了从“国家财政”向“财政国家”的转变。

前 言



2016年11月，拙著 *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 1644—1911* 在 Brill 出版社出版。《清代关税：1644—1911年》一书，即是以该书的翻译稿为基础写成的。

当初在写作 *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 1644—1911* 的过程中，我努力直接以英文方式进行思维和表达，而非先写出中文稿，再将其翻译成英文。这就导致该书中有许多行文和表达都与中文的写作方式大相径庭。在决定翻译该书后，许存健先生高效地承担了这一工作，迅速将其翻译成中文。在此，向许存健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译稿的基础上，我又逐一对中文稿件进行格式调整和引文复原。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我已经出版《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对嘉道时期（1796—1850年）的关税变化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所以在《清代关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我对嘉道时期的分析尽量从简。

2005年，我开始涉足清代关税史的研究。十余年来，得到诸多前辈和朋友的帮助。我不善言辞，很少向众多师友当面表达谢意，但其实一直铭记在心。特别是邓亦兵研究员将多年来在海外搜集的关税史料无偿送我查阅，深感无以为报。

本项研究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书中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清代皇帝世系



顺治 1644—1661 年

康熙 1662—1722 年

雍正 1723—1735 年

乾隆 1736—1795 年

嘉庆 1796—1820 年

道光 1821—1850 年

咸丰 1851—1861 年

同治 1862—1874 年

光绪 1875—1908 年

宣统 1909—1911 年

目 录



序一

序二

前言

清代皇帝世系

导论 / 1

第一章 研究方法 / 5

（一）学术史回顾 / 5

（二）数据资料 / 6

第二章 清代关税制度 / 12

（一）传统中国的关税制度 / 12

（二）清代常关制度 / 15

（三）政策调整 / 17

（四）税率和附加税 / 26

（五）洋关 / 32

第三章 边疆边贸各关 / 36

- (一) 山海关/ 36
- (二) 张家口/ 40
- (三) 杀虎口/ 44
- (四) 归化城/ 46
- (五) 打箭炉/ 48
- (六) 凤凰城中江 / 50
- (七) 奉天牛马税/ 52
- (八) 梧厂、浔厂/ 52
- (九) 直隶潘桃口/ 54
- (十) 其他税关 / 56
- (十一) 本章小结 / 59

第四章 运河长江沿线各关 / 61

- (一) 崇文门/ 61
- (二) 左、右翼/ 64
- (三) 坐粮厅/ 70
- (四) 淮安关 / 72
- (五) 浒墅关/ 79
- (六) 扬州关/ 82
- (七) 芜湖关 / 85
- (八) 凤阳关/ 89
- (九) 龙江西新关/ 92
- (十) 九江关 / 96
- (十一) 赣关/ 99

- (十二) 北新关、南新关/ 102
- (十三) 临清关 / 107
- (十四) 太平关/ 113
- (十五) 武昌厂/ 115
- (十六) 荆州关、湖北新关/ 117
- (十七) 夔关、渝关/ 121
- (十八) 本章小结 / 124

第五章 沿海各关 / 126

- (一) 天津关/ 126
- (二) 天津海关/ 129
- (三) 江海关/ 131
- (四) 浙海关/ 135
- (五) 闽海关/ 139
- (六) 粤海关 (1861—1911 年) / 143
- (七) 东海关/ 145
- (八) 本章小结 / 145

第六章 洋关/ 148

- (一) 粤海关 (1865—1861 年) / 149
- (二) 江海洋关 (1844—1861 年) / 153
- (三) 浙海洋关 (1844—1861 年) / 154
- (四) 厦门、福州洋关 (1844—1861 年) / 154
- (五) 1861 年之后的洋关/ 155
- (六) 本章小结 / 160

第七章 关税和经济 / 163

（一）常关与洋关 / 163

（二）户关与工关 / 173

（三）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 / 186

第八章 结论 / 201

附录 / 205

附录 A-常关征税表：1723—1910 年 / 205

附录 B-粤海关税收数据表：1723—1860 年 / 242

附录 C-洋关征税表：1844—1910 年 / 243

参考文献 / 252

索引 / 255

后记 / 260

表 目 录



- 表 1.1 1811 年和 1812 年各关征收额数表 / 7
- 表 2.1 明代各关收入表 / 14
- 表 2.2 晚清关税定额表 / 24
- 表 2.3 1686 年浒墅关梁头银和船只长度关系表 / 27
- 表 2.4 粤海关中国船只梁头银 / 28
- 表 2.5 粤海关日本、西洋船只梁头银 / 28
- 表 2.6 嘉道时期浒墅关各类平余银 / 31
- 表 2.7 洋关建立的时间和条约 / 33
- 表 3.1 清代山海关税额表 / 37
- 表 3.2 清代张家口税额表 / 41
- 表 3.3 清代杀虎口税额表 / 45
- 表 3.4 清代归化城税额表 / 47
- 表 3.5 清代打箭炉税额表 / 49
- 表 3.6 清代梧州厂税额表 / 53
- 表 3.7 清代浔州厂税额表 / 53
- 表 4.1 清代崇文门税额表 / 62
- 表 4.2 清代左翼税额表 / 64
- 表 4.3 清代右翼税额表 / 67

- 表 4.4 清代坐粮厅税额表 / 70
- 表 4.5 清代淮安关税额表 / 73
- 表 4.6 清代浒墅关税额表 / 79
- 表 4.7 清代扬州关税额表 / 82
- 表 4.8 清代芜湖户关税额表 / 86
- 表 4.9 清代芜湖工关税额表 / 86
- 表 4.10 清代凤阳关税额表 / 89
- 表 4.11 清代龙江关税额表 / 92
- 表 4.12 清代西新关税额表 / 92
- 表 4.13 清代九江关税额表 / 96
- 表 4.14 清代赣关税额表 / 99
- 表 4.15 清代北新关税额表 / 103
- 表 4.16 清代南新关税额表 / 106
- 表 4.17 清代临清户关税额表 / 108
- 表 4.18 清代临清工关税额表 / 109
- 表 4.19 清代太平关税额表 / 113
- 表 4.20 清代武昌厂税额表 / 115
- 表 4.21 顺治朝荆州关税收数额表 / 118
- 表 4.22 清代荆州关税额表 / 118
- 表 4.23 清代夔关税额表 / 121
- 表 5.1 清代天津关税额表 / 127
- 表 5.2 清代江海关税额表 / 132
- 表 5.3 清代浙海关税额表 / 135
- 表 6.1 清代粤海关税额表 / 149

- 表 6.2 1861—1866 年江海洋关税收数据表 / 156
- 表 6.3 江海洋关税收数据表 (1873—1875 年) / 156
- 表 6.4 1876 年江海洋关税收数据表 / 157
- 表 6.5 1879—1886 年江海洋关税收数据表 / 157
- 表 6.6 1861—1910 年洋关税收数据 / 159
- 表 7.1 清代常关、洋关税收数据表 / 163
- 表 7.2 1723—1910 年户关和工关所征关税表 / 174
- 表 7.3 档案中记载的常关税收数额表 / 179
- 表 7.4 清代人口规模数据表 / 187
- 表 7.5 清代人均关税额 / 187
- 表 7.6 常关和洋关实际征收关税额 / 189
- 表 7.7 1840 年粮食、棉布、盐、茶叶的市场价值量估计 / 197
- 表 7.8 清代市场价值量估计 / 198
- 表 7.9 清代人口数据调整 / 199
- 表 7.10 清代真实资本和人均商业市场价值量 / 199
- 表 8.1 清前中期财政收入表 / 201
- 表 8.2 晚清财政收入表 / 203
- 表 A-1 1723—1909 年部分常关征税表 / 205
- 表 A-2 1723—1910 年部分常关征税表 / 210
- 表 A-3 1723—1910 年部分常关征税表 / 216
- 表 A-4 1723—1908 年部分常关征税表 / 221
- 表 A-5 1723—1909 年部分常关征税表 / 226
- 表 A-6 1723—1909 年部分常关征税表 / 231
- 表 A-7 总表 / 237

- 表 B-1 1723—1860 年粤海关征税表 / 242
- 表 C-1 1844—1911 年部分洋关征税表 / 243
- 表 C-2 1863—1910 年部分洋关征税表 / 245
- 表 C-3 1861—1910 年部分洋关征税表 / 246
- 表 C-4 1861—1910 年部分洋关征税表 / 248
- 表 C-5 1861—1910 年部分洋关征税表 / 249

图 目 录



- 图 3.1 山海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36—1911 年） / 38
- 图 3.2 张家口税收趋势示意图（1735—1898 年） / 42
- 图 3.3 杀虎口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911 年） / 45
- 图 3.4 归化城税收趋势示意图（1761—1862 年） / 48
- 图 3.5 打箭炉税收趋势示意图（1735—1911 年） / 50
- 图 3.6 凤凰城中江税收趋势示意图（1729—1893 年） / 51
- 图 3.7 奉天牛马税税收趋势示意图（1740—1846 年） / 52
- 图 3.8 梧州、浔州厂税收趋势示意图（1725—1911 年） / 54
- 图 3.9 直隶潘桃口税收趋势示意图（1735—1861 年） / 55
- 图 3.10 边疆边贸税关税趋势示意图（1723—1911 年） / 59
- 图 4.1 崇文门税收趋势示意图（1735—1911） / 63
- 图 4.2 左翼税收趋势示意图（1759—1911 年） / 65
- 图 4.3 右翼税收趋势示意图（1771—1911 年） / 68
- 图 4.4 坐粮厅税收趋势示意图（1732—1911 年） / 71
- 图 4.5 淮安关税趋势示意图（1728—1911 年） / 73
- 图 4.6 浒墅关税趋势示意图（1725—1860 年） / 80
- 图 4.7 扬州关税趋势示意图（1729—1911 年） / 83
- 图 4.8 芜湖户关税趋势示意图（1735—1911 年） / 87

- 图 4.9 芜湖工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35—1911 年） / 88
- 图 4.10 凤阳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7—1911 年） / 90
- 图 4.11 龙江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5—1852 年） / 93
- 图 4.12 西新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32—1852 年） / 93
- 图 4.13 龙江、西新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4—1852 年） / 94
- 图 4.14 九江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4—1901 年） / 97
- 图 4.15 赣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30—1911 年） / 101
- 图 4.16 北新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865 年） / 104
- 图 4.17 南新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32—1865 年） / 106
- 图 4.18 临清户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6—1911 年） / 109
- 图 4.19 临清工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35—1911 年） / 110
- 图 4.20 太平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4—1911 年） / 114
- 图 4.21 武昌厂税收趋势示意图（1727—1911 年） / 116
- 图 4.22 荆州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7—1911 年） / 119
- 图 4.23 湖北新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857—1911 年） / 121
- 图 4.24 夔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6—1911 年） / 122
- 图 4.25 渝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34—1911 年） / 124
- 图 4.26 运河长江沿线各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911 年） / 125
- 图 5.1 天津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35—1911 年） / 127
- 图 5.2 天津海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807—1911 年） / 130
- 图 5.3 江海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35—1911 年） / 133
- 图 5.4 浙海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35—1911 年） / 137
- 图 5.5 闽海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4—1911 年） / 140
- 图 5.6 粤海关常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861—1911 年） / 144

- 图 5.7 东海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861—1911 年） / 145
- 图 5.8 沿海海关征收国内货物税趋势示意图（1723—1911 年） / 146
- 图 5.9 沿海海关税收趋势示意图（包括粤海关）（1723—1911 年） / 146
- 图 6.1 粤海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5—1860 年） / 150
- 图 6.2 江海洋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844—1861 年） / 153
- 图 6.3 浙海洋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844—1861 年） / 154
- 图 6.4 厦门、福州洋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844—1861 年） / 155
- 图 6.5a 洋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860 年） / 162
- 图 6.5b 洋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861—1911 年） / 162
- 图 6.5c 洋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911 年） / 162
- 图 7.1a 常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795 年） / 170
- 图 7.1b 常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95—1850 年） / 170
- 图 7.1c 常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851—1911 年） / 170
- 图 7.1d 常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911 年） / 171
- 图 7.2 洋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840—1911 年） / 171
- 图 7.3 常关和洋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911 年） / 172
- 图 7.4 常关和洋关的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850 年） / 172
- 图 7.5 常关和洋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841—1911 年） / 173
- 图 7.6 加上估算数据后的常关与洋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911 年） / 173
- 图 7.7 三类常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911 年） / 185
- 图 7.8 加上粤海关的数据后三类常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911 年） / 185
- 图 7.9 包括推算的缺失数据的常关税收趋势示意图（1723—1911 年） / 186
- 图 7.10 清代人口规模示意图 / 187
- 图 7.11 清代人均关税额趋势示意图（1776—1910 年） / 188

- 图 7.12 1644—1911 年估算物价趋势示意图 / 189
- 图 7.13 关税真实趋势示意图（1723—1795 年） / 195
- 图 7.14 关税真实趋势示意图（1796—1850 年） / 195
- 图 7.15 关税真实趋势示意图（1851—1910 年） / 196
- 图 7.16 关税真实趋势示意图（1723—1910 年） / 197
- 图 7.17 清代真实人均市场资本价值量 / 199

导 论



在研究中国的政治史时，必须把经济因素纳入考虑的范畴，正如研究中国经济史时需要考虑政治因素一样。在国家社会结构中，政治和经济这两条线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财政是判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快慢的重要指标。但如果要以此来估算清代（尤其是 1840 年之前）的经济活动，则必须把中国历史上财政和经济的所有特殊性、复杂性都纳入考量的范围。笔者倾向于认为，只有在充分占有各种国家财政资料后，才有可能推导出清代中国的经济总量。

尽管处于大变革时代，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1644—1911 年）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从财政方面来看，这也是中国“从国家财政转变为财政国家”的重要转型时期。1850 年之前，清代的财政系统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即常规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临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

常规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五个方面，即田赋、漕粮、盐税、关税和杂税（杂税包括渔税、茶税、矿税等）。

在以上五个方面中，田赋是财政收入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部分。在清前中期（1840 年以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 4500 万两，其中田赋收入约为 2500 万两，占每年财政总收入的 50% 以上。田赋在很大程度上由外部因素决定，如气候、收成和自然灾害，当然也与耕地的数量和产量有关。但是田赋的收入弹性很小，具有极其稳定的特点，导致我们很难用田

赋数据来估算国家实际的经济状态和经济发展。

财政收入中的第二项是漕粮，漕粮仅从八个省份（即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山东和河南）征收。这些省份都靠近水道，特别是靠近运河和长江。每年漕粮的征收数额为 300 万—400 万石。传统中国运输谷物的方式相对单一，水运是唯一便捷的运输方式。1850 年以前，漕粮作为“天庾正供”，几乎从不会蠲免。然而，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 年）发生后，却让这个政策发生了改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八个有漕省份在很多方面都遭受了灾难性的破坏。晚清最有权势的三个地方官，即曾国藩（1811—1872 年）、李鸿章（1823—1901 年）和左宗棠（1812—1885 年），都反对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完全恢复漕运旧制。减赋运动由此展开。义和团运动之后，在巨大的赔款压力之下，清廷只能维持年漕运 100 万石的水平。显然，同样很难用漕粮的征收数额来估算清代经济活动的情况。^①

常规财政收入中的第三项是盐税。盐税征收额的增长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即人口总量和人均食盐消费量。尽管清代人口增长很快，但人均食盐消费量不大可能发生太大的变化。清前期，政府把全国划分为七个盐区，每个盐区所产之盐只能在其领地内行销。如果他们把盐销往其他领地，就会被认为是“走私”，政府将会对此进行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有清一代的走私行为还是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盐税增长的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清前期的盐税收入一直保持在每年 500 万两左右。当然，到了晚清时期，当厘金被推广后，来自盐税的收入（即盐厘）出现了持续的增长。这恰好说明，以清前期盐税的增长来推导经济活动水平是十分困难的。

杂税是财政收入中的第五项。如果国家需要，杂税可以快速做出调整。杂税对财政总收入增加的贡献主要来自晚清时期，尤其是新开发出来

^① 详细内容可参见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年。

的税收名目。不过，在清前期的各项财政收入中，财政总收入的增长却很少来自于杂税。当时每年的杂税收入大约为 100 万两白银，只占财政总收入的 2% 左右。许多研究财政史的专著和文章，甚至直接忽略了杂税的影响。

与上文讨论的税收不同，财政收入中的第四项——关税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税种，不但征收数量较多，而且征收方式也非常灵活。例如，一艘载满商品的船只通过某个税关，通常是按固定的税率收税（一般为货物价值的 2%—5%）。一般而言，如果需要更多的资金，政府就会提高关税征收税率，这也是增加财政收入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如果经济情况良好，商贸活动就会扩大；如果经济情况糟糕，商贸活动就会减少。所以从理论上讲，如果想要找到一个可以反映清代社会 and 经济发展状况的财政收入指标，那么关税会是首选。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代传统的财政体系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不做出改变，这个体系将难以维持。政府最大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增加财政收入。为了避免财政体系崩溃，清政府推行了很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措施是推行厘金制度和大幅度地提高关税税率。可以说，这两个措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财政结构：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商税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关税、厘金和盐税的征收总量差不多增加为田赋的三倍。尤其是关税，在晚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晚清最强有力的财政工具。

正如在宋代已经证明过了的那样，在中国传统社会，关税及其他征收灵活、可调节性的税种是应付政府财政扩张的最有效工具。晚清时期，中国已经从农业型财政国家转变为现代、商业型财政国家，其财政特性也随之发生改变，即从一个稳固型的财政演变为扩张型的财政，从一个保守的财政发展为一个先进、更有适应能力的财政，笔者将其概括为“从国家财政转向财政国家”的转变。在此意义上，研究清代关税也是一项有深远意

义的工作。

尽管清代有些税关位于边疆地区，但清前期税关主要分布在运河和其他河流沿线。此外，在沿海地区，包括天津关、天津海关、东海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也抽收国内货物税。通常学者们喜欢仅关注其中的某个或某几个税关，而本书则把全部税关都纳入研究范围。在清代，通常将设于沿海的税关统称为“海关”，如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但其中大多数时间仅粤海关征收对外贸易。1842 年《南京条约》签署后，服务于对外贸易的口岸相继开放。为了加以区别，笔者将抽收国内商品的税关称为常关，将征收对外贸易的税关称为洋关。

1861 年，海关总税务司建立后，粤海关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负责抽收国内贸易货物，另一部分负责抽收对外货物。由于在很长的时间内，粤海关都是唯一管理对外贸易的税口，为了研究方便，本书把 1861 年以前的粤海关归入洋关，1861 年以后的国内货物税收归入常关，对外贸易税收归入洋关。

在过去的百年间，学者们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已经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具有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史，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史学研究也逐渐流行。特别是过去十年间，随着历史时期 GDP 研究的深入，希望获得中国历史上经济史资料的呼声愈加强烈。但是很显然，目前许多具有较长时段性的序列数据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辨析。尽管清代财政的各种数据均有所缺失，但其中的关税数据是相对最为完整的。考虑到以往的清代税关研究主要集中关注于关税制度及其运作，以及个别税关的情况，因此笔者决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搜集数据，相信通过查阅第一手的档案史料文献，阐释其背景和意义，为学界提供一份完整可靠的数据链，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一章 研究方法



（一）学术史回顾

尽管从政治史和经济史视角研究关税制度和税收情况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但很多研究都没有采用现代学科的方法，如经济学和统计学。学界存在的这种状况直到近年来才发生改变。

最早出版的中国关税史著作是 1937 年出版的《中国关税史》，作者是吴兆莘。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无法利用清代的档案文献，而且他的分析也有些简单化。此后，类似的著作相继出版，但分析依然相对浅显，而且篇幅也都较为短小。例如，彭雨新于 1956 年出版的《清代关税制度》一书仅有 44 000 字，这就导致很多问题无法深入展开叙述。

21 世纪之后，关注清代关税问题的著作大量涌现。2000 年，黄国盛的《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海关》，探讨了清前期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的关税征收。2004 年，祁美琴的《清代榷关制度研究》，描述了清代的关税制度，并阐述了中央关和地方关的概念。2008 年，邓亦兵的《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出版，该书非常详细地分析了 1644—1840 年的关税制度。2010 年，廖声丰的《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出版，该书的一个观点是关税数额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同一时期的日本学者也对关税问题多有涉及，如香坂昌纪、岸本美绪和泷野正二郎，他们

写了很多关于清代税关的论文，但都没有出版专著。^①

由于出现了大量的清代关税研究论文及著作，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回顾与综述的文章也纷纷再现。其中距今最近的几篇是：廖声丰《近年来明清时期的榷关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1期）、黑广菊《清时期的榷关研究概述》（《历史教学》2004年第4期）和杨建庭《近十年清代榷关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对于梳理研究线索颇有益处。

大体而言，上述研究成果的主要兴趣点在于描述清代关税制度，而不是从财政史的角度整理和分析关税数据。当然，有两组成系列的税收数据对本书有着重要的价值。第一组由汤象龙搜集整理，体现在《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年》一书中。在该书中，他为我们系统地提供了1861—1910年海关的数据。他的主要资料来源于大量的抄档，这是他和其他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共同搜集整理而来。现在这些抄档均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②由于数据庞大琐碎，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汤象龙书中的数据存在一些误差，这一问题将放在第六章进行讨论。另一组与本项研究相关的数据由笔者搜集整理，即于201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朝嘉道关税研究》一书。该书统计了1795—1850年（嘉庆道光时期）的关税数据。^③

（二）数据资料

研究清代关税，有一些研究者的数据来源于两种资料，即《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和王庆云的《石渠余

① 香坂昌纪：《清代中期的杭州と商品流通》，《东洋史研究》1991年第1号，第34—57页；岸本美绪：《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經濟動》，东京：研文出版社，1997年，第118—119页；Takino Shojiro, Takino Shojiro, Qing Dai Qian Long Nian Jian Chang Guan Zheng Shui E (The Quota of Customs Duties in the Qianlong Reign), *Oriental History Journal of Kyushu University*, vol 29, 2001.

② 20世纪30年代，为了抄录这些清代的档案，得益于陶孟和（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该所在1934年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调查所）的努力，汤象龙、梁方仲等得以雇用很多人员对存于故宫文献馆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清代档案进行系统整理。此后，这次抄录的档案存放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

③ 2017年3月，该书的第二版在科学出版社出版。

纪》。然而，通过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资料的检验，笔者发现《清单》中 1811 年和 1812 年两个年份内，张家口、山海关、杀虎口、崇文门、淮安关、浒墅关、扬州关、西新关、九江关、龙江关和北新关的数据（表 1.1）也是不准确的。当上述不可靠的各关税收数据相加后，会比《清单》提供的数据高出二十多万两。^①

表 1.1 1811 年和 1812 年各关征收额数表 （单位：两）

税关	年份	《清单》 数据	修正后的 数据	税关	年份	《清单》 数据	修正后的 数据
崇文门	1811	290 544.6	322 655.34	浙海关	1811	79 952.4	79 943.155
	1812	253 409.4	286 126.5		1812	79 960.5	79 952.48
左翼	1811	13 676.9	20 748	闽海关	1811	208 368.2	187 060.997
	1812	14 320.2	37 060		1812	232 440.6	189 539
右翼	1811	12 571.9	23 929.92	太平关	1811	134 352.9	134 352.9
	1812	12 949.2	23 951.02		1812	134 383.5	134 383.5
淮安关	1811	274 531	221 727.208	粤海关	1811	1 165 263.1	1 165 263.126
	1812	223 848	272 894.376		1812	1 347 936.8	1 347 936.891
浒墅关	1811	409 445.2	373 176.946	坐粮厅	1811	13 367.5	13 367.5
	1812	430 231	392 801.945		1812	12 379.6	12 379.6
扬州关	1811	154 270.7	153 955	山海关	1811	61 810	114 231.405
	1812	144 568.5	144 360		1812	61 867.1	111 598.091
芜湖户关	1811	230 047.8	230 047.88	张家口	1811	20 004.3	60 643.14
	1812	230 049.5	230 049.58		1812	20 004.6	60 644.04
西新关	1811	51 969.9	52 888.576	杀虎口	1811	16 919.9	45 677.408
	1812	53 234.9	51 969.912		1812	16 919.9	45 755.338
凤阳关	1811	107 227	107 227.095	归化城	1811	26 767.5	26 767.5
	1812	95 488.8	95 488.826		1812	26 666.1	26 666.1
江海关	1811	73 612.7	73 606.635	龙江关	1811	135 371.9	134 428.554
	1812	73 606.6	73 612.767		1812	133 984.4	135 371.996
天津关	1811	83 942	96 291.833	芜湖工关	1811	117 204.6	117 204.66
	1812	82 533.8	94 884.583		1812	117 201.8	117 201.86
临清户关	1811	37 539.5	32 285.42	临清工关	1811	4 472.4	4 375.3
	1812	36 466.1	33 151.01		1812	5 418.9	5 157.27

① 倪玉平：《王庆云〈渠余纪〉所载道先关税辨析》，《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5 期；《〈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所载关税额辨析》，《历史研究》2008 年第 5 期。

续表

税关	年份	《清单》 数据	修正后的 数据	税关	年份	《清单》 数据	修正后的 数据
九江关	1811	492 123.3	514 948.258	南新关	1811	25 465	29 444.939
	1812	584 005.4	492 123.389		1812	25 465	29 474.059
赣关	1811	122 136.3	122 136.3	天津海关	1811		46 500
	1812	121 610.8	121 610.8		1812		50 119
北新关	1811	196 125.3	203 362.284	荆州关	1811		28 214.174
	1812	190 343.2	200 125.391		1812		23 952.888

资料来源：倪玉平：《〈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所载关税额辨析》，《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从表 1.1 可以看出，1811 年的数据应该是 4 736 461.453 两，而不是《清单》的 459 846.2 两；1812 年的数据应该是 4 920 342.212，而不是《清单》中的 4 810 340.5 两。

王庆云的《石渠余纪》也有类似的情况。通过对比档案史料可知，《石渠余纪》中关于 1841、1842、1845 和 1849 年崇文门、左翼、右翼、南新关和浙海关的数据是不准确，最终的统计数据也比《石渠余纪》高出 100 万两。^①

这些材料存在的不足之处充分说明了使用第一手档案材料的重要性。为了统计 1644—1911 年的关税数据，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史料主要如下。

——朱批奏折，档案登记号以数字 04 开头。例如，根据档案号 04-01-35-0326-043 可知，它是乾隆十五年（1750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山海关监督高诚上奏的奏折。

——题本，档案登记号以数字 02 开头。例如，根据档案号 02-01-04-14795-017 可知，它是乾隆十九年（1754 年）五月初十日，户部尚书蒋溥上奏的奏折。

——录副奏折，档案登记号以数字 03 开头。例如，03-604-040 档案号

^① 倪玉平：《王庆云〈渠余纪〉所载道先关税辨析》，《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5 期。

系指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十一月十二日，山海关监督常福上奏的奏折。

——上谕档，来自于皇帝的谕令，当引用该资料时，以档案中登记的发布日期为顺序。

第二种是来自于台北的清代档案，其史料主要如下。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清代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例如，A155-104，系指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三十日，湖南布政使温福奏报有关辰关的征税情况。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例如，档案号为070226的档案，系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月二十三日，广东巡抚郭世勋奏报太平关的征税情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例如，档案号为000681的档案，系指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二十七日，苏州织造征瑞奏报浒墅关征税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均选编出版过大量的原始档案，本书所参考的出版物如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档案出版社，1998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5 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 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8 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 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3 年。

在史料选择方面，笔者优先选择已经出版的档案，并在标注时标明出版页码。

第三种是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抄档资料。抄档系直接摘抄自原始档案，在经历近百年的历史后，有些原始档案已经遗失，有时只能依靠抄档数据。当然，本书遵循的原则是，优先检索第一手的档案，而不是抄档；只有在找不到原始档案的情况下，才会引用抄档数据。抄档中和关税相关的内容包括《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清代海关收入》、《清代海关开除》和《题本·关税》。

《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共计六册：

第一册：江海关、苏州关、镇江关、金陵关、芜湖关、九江关。

第二册：江汉关、岳州关、长沙关、沙市关、宜昌关、重庆关。

第三册：杭州关、浙海关、瓯海关、闽海关、台湾各关。

第四册：广东各关、梧州关、南宁关、镇南关、蒙自关、思茅关、腾